

外公

文/李幸

我3岁、5岁时两次到过母亲老家上海,但从没见过她的父亲——我的外公;一直以为外公逝于我1岁时,但最近才知道,其实他活到了我18岁。

外公姓张,膝下3男4女。4女里,大小两个一型,鹅蛋脸;中间两个一型,圆脸。从前那条长街上,都知道张家有4个漂亮女儿。

2009年,我出差去上海,听说那一带要拆迁,就过去看。开拆了,弄堂里人去楼空,记忆里的石库门屋顶已掀。横着竖着几条大红横幅:支持地铁某号线建设,云云。临街房子还没动到,有一家小店,卖服装的,招牌是“张家小姐”。我拍了张照。

我的大姨,1949年前嫁了个如今说的土豪,结婚后有了孩子,丈夫开始寻花问柳,就离了。靠读的会计专业,自己过活。再嫁,那是后话。

二姨,应该是学的幼教,毕业后在幼儿园做老师,做了一辈子。

外公让女孩子上学上到如今说的中专或职校,当时实属不多见。一是因为有钱,二也是见识吧。当时女性婚后多数还是相夫教子,但也有一部分,开始做职业女性了。

到了我妈的时候,小学读完,

不让再读了,说是她奶奶,也就是外公他妈没人照顾,就被派到独居的奶奶那儿陪住了。

外公是遗腹子,他妈那时是上海纱厂的女工,将他养大成人,不容易。也因为时局动荡,经济吃紧,连带着动摇了其培养职业女性的想法。母亲侍候她奶奶,相当于“帮佣”吧。

外公的长子、我的大舅,1949年那年,外公给他一笔钱,让他只身去香港闯荡。二舅其时在读大二,全家就出了这一个大学生,只能把书念完再说。三舅中学即将毕业。小姨还在读着小学。

离开上海多年后,母亲第一次回家省亲,两年后,又一次。母亲讲过那两回省亲的情景,但都没有关于外公的叙述。此后也从未有人跟我说过外公。

只看过外公的照片,国字脸,高鼻梁,可谓相貌堂堂也。

母亲忆起前两次省亲,会说到外婆。为了去上海,父亲专门做了套毛哔叽中山装,买了皮鞋,还有派克钢笔,用来别在上衣口袋里。算起来该是他两个月的薪水。见到这个乡下来的一身正装的女婿,外婆摇摇头,说,还是穿军装吧。当时已经实行军衔制,父亲是大尉,肩章上的星多。

说到南京路吃冰淇淋逛商场、大世界看影戏、外滩游玩……就是没说过外公那会儿在哪儿、在干啥。

终于有一回,偷看到母亲写的向组织汇报的思想材料,说到家庭出身,说到其父、我的外公:曾做过国民政府的保长,因为是街上小学的董事,还曾在校门口打过一化缘的和尚一嘴巴子。

震惊。

小孩子,藏不住秘密,就跟同桌的女孩说了。后来这个女孩跟我有矛盾,在班上说我爷爷是个大坏蛋。我纠正她,不是爷爷,是外公。

1949年,政府给外公定的成分是“工商业兼地主”。工商业就是买卖比小商小贩做得大点儿,还好,其时尚属统战对象,地主则是严打对象了。外公有几个铺子。挣了钱,去乡下买了地。大舅的儿子曾跟我说:你外公多有眼光啊,买地,那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商啊。又说,怎么不买金条呢,好藏,分起来也便当。

外公当时过得奇葩。送出一儿一女参军,逢年过节,政府按例慰问军属,外公外婆齐齐立在自家临街的门口迎候。平常日子,要去政府报到,接受讯问,因为还定了个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,老了,监外执行,居家监管。

这顶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,一直没明白是怎么戴上的。

2014年秋天,我的表姐因为嫁女,邀我到上海参加婚礼。我的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而且我想带她到奶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看看,这就受邀前往。婚礼搞得很大,陪嫁则是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和一辆路虎。

我这个表姐,当年下乡插队,退休后与丈夫一起做生意。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,跟我说,张家儿女里,数她继承了爷爷(我外公)的生意头脑。

舅姨有好几位来了,我就问起了外公的事。

“外公是我出生第二年就去世了,吧?”

都有点儿吃惊的样子。

“不,是你长大以后。”

现在吃惊的是我。

关于外公怎么会是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的问题,不好再问。离开上海后,问健在的父亲,他85岁了。

他说,抗战结束后,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上海各界热烈庆祝,作为工商业界人士代表,外公在一个集会上做过演讲。■

外婆

文/顾前

人上了点岁数,就常常会怀旧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,外婆就常到我家来,住上一一年半载,然后再回到家乡去。过了一阵子,外婆又会重新来到我家。从我的童年时代到我的少年时代,外婆断断续续地在我家住了不少年头,帮我做家务事,照顾我的生活。

外婆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外婆(我的亲外婆很早以前就去世了),她是我妈的婶婶,是我妈五叔的老婆。听我妈说,外婆的身世很苦,她早年和我妈的五叔定了亲,还没来得及结婚,我妈的五叔就参加了红军,接着她就住到我妈的五叔家里,和公公婆婆一起过日子,等着我妈的五叔回来。可我妈的五叔始终没有回来。解放后,才得到确切消息,我妈的五叔早就牺牲了,牺牲在毛儿盖,长征的路上。她没有再嫁人(其实严格说起来,她始终没有嫁过人),外婆去世后,她就一个人生活,靠村上发的救济粮过日子,她算五保户。我妈看她可怜,就经常把她从家乡叫出来,到我家来过过。

外婆对我很好,什么事都替我做,天冷了,外婆晚上早早地给我铺好被子,再灌上热水袋给我暖被窝。早上我的洗脸水外婆都给我倒好,然后才叫我起床。夏天我午睡起来,碗橱里总有一碗外婆给我准备的白糖拌西红柿等着我吃。我妈规定的我必须自己洗的内衣内裤和袜子,外婆总是趁我妈不注意给我偷偷洗掉,我放脏内衣内裤和臭袜子的地方,只有外婆和我知道。我没事还爱和外婆逗着玩,外婆说的是安徽桐城乡下方言,她把“叫”说成“嗽”,把“腿子”说成“蹄子”,我就对她说:“外婆,你‘嗽’什么?”要不就说:“外婆,天要变了,你的‘蹄子’疼吗?”记得有一次我还把外婆给气哭了。我爱吃肉丸子,外婆便天天给我做,可有一天不知是她忘了还是怎么回事,反正当我吃饭的时候发现没有肉丸子,就说了外婆几句,我妈立即严厉训斥了我,但饭后外婆还是一个人躲在厨房悄悄落泪。

我中学毕业后外婆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了,那时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,虽然她自己还想来,可家乡的亲戚却不准她来了,一是怕她路上出问题,二是怕她来了我家后如果病倒了,会给我家添麻烦。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我妈叫她来的态度已经不那么坚决了。我妈逢年过节还给外婆寄钱,直到外婆去世。外婆独自死在她那间土坯房里。

很多年过去了。今年夏天,我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,第一次去了一趟我妈的家乡。在亲戚的陪同下,我在我亲外婆和姥爷的墓前烧了纸,放了鞭炮。然后我问亲戚,我妈五叔的墓在哪里。亲戚把我领到不远处一块杂草丛生的地方,对我说,就是这儿了。我跪下去,磕了三个头。我本来以为我会大哭一场的,可没想到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。■



戌狗
摄/胡正东

十子下乡

文/任芙康

谁都晓得,同一件事,有人说出来大有意思,有人说出来意思不大;又谁都晓得,意思不大的保平安,大有意思的出危险。我上中学时,有位教务主任,讲话学生爱听,就是训人,都别具一格。比如,学生扫地不洒水,搞得尘土飞扬,他一皱眉头:“你们哪里是在搞卫生,简直是制造白色恐怖嘛!”同学们听了这话,非但不恐怖,反而觉得刺激,伸舌掩嘴地乐起来。没多久搞文革,“肮脏的历史”加上“恶毒的现行”,教务主任被昔日敬佩他的学生们收拾得死去活来。

有个叫十子的校友,同样让人刮目相看。十子语出惊人,有回他讲:列宁有个说法,在一切艺术中,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(众同学闻所未闻,愈加洗耳恭听)。是这样的吗?当然不是(大伙同时为之一震)。根据本人粗浅之研究,在一切艺术

中,对我们最重要的是——相声(结论如此新颖,煽起一阵莫名的兴奋)。

有一位女生,长得很漂亮,导致十子与另一男生成为情敌。那男生亦非等闲之辈,是头年全省中学生百米赛季军,所以挺有竞争实力的。而十子十分从容,采取智取,向女生写信抒情。谁知求爱未遂,竟惹出大祸。一切都突如其来,经师生大会公开批斗,十子被开除学籍,注销本城户口,遣送乡下劳动。原来,为了俘获对方,十子于情书中断言,季军固然腿脚麻利,但未来的出息绝对有限。但念及同窗情谊,他日后可以给季军安排个省长之类干干。而十子为自己畅想的位子,则是指挥各省省长的那把交椅。这就把话说大了,任谁读来都害怕,女生遂将情书上交。

十子从校园里消失了。我的记

忆中,他成为本地城镇学生下乡务农第一人。转年秋天,我邀约数人去看望十子。惊奇的是,十八岁的十子居然已经结婚了。我们悄声问他:是不是城里的浪漫泡了汤,就用乡下的实际作补偿?十子坦然告:“看我做家务太笨,贫协主任批准我娶妻一名。虽说老婆富农的家庭成分高了点,但与我半斤对八两的搭配,已经非常合适了。”那位腼腆的村姑,似乎还未完全长大,但她灶间动作不慢,很快就弄出饭菜端了上来。小小餐桌是十子的手艺,用桉树板钉制而成。矮凳不够用,就搬了小两口种的南瓜来坐。听着我们惊叹臀下这些大如脸盆的硕果,十子颇为感慨:“人生在世,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?”他看看大家,伸出一双指头:“两个字——吃饭。”说罢,他脸上泛出自嘲的无声的笑。十子从前的模样依

稀又见,但毕竟已然两重天地,叫人不禁有些鼻子发酸。

过了一年,“文革”到来,当我从北方串联回到家乡,全城已是一片混乱。有一天,我在广场观看游斗地委书记,偶遇进城办事的十子。吃净我掏钱奉送的两碗担担面,十子对我拍肩道别:“大闹天宫之后,猴子们的出路就在花果山。兄弟,要不了多久啦,乡下见吧!”十子说得不明不白,带些预测、算命的味道。两年之后,1968年12月,时局峰回路转,果然被十子言中。领袖挥手改航向,千万学生换战场。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倏然间被抽断脊梁。此后随着知青返城,十子携妻远走,不知所往。二十多年间我多方打听,其去向各说不一,令人时生惆怅。■